

橘  
洲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何朝霞  
校读/肖应林

插画何朝霞

肆

“国家之计，莫过于漕。”朝廷利用河道，将征收的赋税、粮食、盐等部分调运至京师或指定地点的水运方式叫作漕运。京城达官贵族的用度，地方将士兵卒的军饷，帝国命脉皆仰于此。始于秦汉，行于唐宋，盛于明清的中国漕运史，至今依然记得每一粒湖湘稻米的去向。

湘资沅澧，连湖达江，自从那一次汉安帝的调运之后，湘米便通过穿梭于湖湘每一条水系的漕船和商船，集于长沙，散入天下。

隋朝大业元年(605年)，一开始便受限于关中粮食短缺的朝廷不堪忍受，在隋炀帝杨广的发动下开始了大运河的浩瀚工程。隋朝的短命到底是因为大运河的开凿，还是因漕运困难造成的粮食危机?多年后，唐朝诗人皮日休在汴河边沉吟良久，写下了答案：“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朝开元年间，通过裴耀卿的漕运改革，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没有了三门峡天险的阻遏，运送湘米的漕船和商船很容易就能把湘米转漕到长安。米价不再昂贵，长安出现了“公私仓廩俱丰实”盛世气象。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娇贵的荔枝可经不起车马太远的颠簸，当湘米从潭州出发的时候，走海关道过来的岭南荔枝也来到漕船上，跟湘米同船入洞庭，渡长江，溯汉水，到商州，然后用陆路的驿马将荔枝送入未央宫，用漕辇将湘米转运到长安的米市。

谁也没有料到盛唐会在一场兵荒马乱之后“一夜入秋”，曾经的大部分漕运路线被中断。通过刘晏再次改革之后，湘米虽成了唐朝中叶为数不多的粮食支撑，但终究像一首残缺的唐诗，漏洞百出。

打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打开了北宋时期的漕运，以及因漕运而繁华的汴京(开封)。朝廷建立起以东京汴梁为中心，通过汴河、蔡河、广济河、黄河辐射全国的漕运网络，而湘米漕运在其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荆湖南路漕粮主要来自湘江、资水流域，这些地区征集的漕粮顺湘水、资水入洞庭湖，经岳州(岳阳)城陵矶入长江，再顺江而下，“自淮入汴至京师”。

宋神宗时，每年从荆湖南路北调运的漕米就达到65万石。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的汴京已经极其繁华，而看着眼前美景的宋真宗每天却急得寝食难安，毕竟唐朝因长安缺粮而崩溃的前车之鉴还历历在目。“东京(汴梁)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而自从入冬以来，气候异常，京城粮食供给一直仰仗的江淮与两浙地区的雨水明显减少。早情发生后，当地稻米大规模歉收。这一阶段，宋真宗每天一早醒来，面对的都是汴京城一百多万张饥饿的嘴。面对蠢蠢欲动的粮价，虽然已经紧急实施了“平籴法”，以每石700文定价收购湘米，同时限制市场溢价，暂时将汴梁粮价涨幅控制在15%以内，但这岂是长远之计?

“还真是让朕头疼!与其靠收购市面上零星的湘米来平抑粮价，还不如紧急增加湘米漕运定额，一次性解决这次因江淮旱灾引起的危机!”想到这里，宋真宗揉捏着眉头的手停了下来。经过与宰相陈尧叟一番商讨后，宋真宗召来了负

伍

《史记·越世家》载，楚怀王时，齐国使者游说越王，称“复讎、庞、长沙、楚之粟也”。

两千五百年前，如果不是楚平王的战马终于踏上长江以南的土地，在澧阳平原最早的古稻田里生长了八千年的稻谷，也不会每一粒都惊慌得四散奔逃。足迹从澧水之滨到烟水深处的潇湘；从洞庭到春风十里的江淮与吴越；从澧州的城头山到道州的玉蟾岩；这一路之上，没有人能够历数一粒稻谷喂养过多少盛世繁华，消弭过多少乱世烟云；也没有人能记得一粒稻谷饱满过多少良臣明君的忧思，唯有在文人的诗文里，一粒稻谷长成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起，惊破的何止是华清池的霓裳羽衣，也让唐朝的漕运再次陷入了困境。尽管“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也没有阻止住“安史之乱”的叛军占领睢阳，掐断了江淮流域这根粮食生命线。“安史之乱”终结的不仅是唐朝的盛世，更是引发了中原毁灭性的大饥荒。黄河流域的千里萧条，长安的十室九空，北方的残破像一道难以愈合的硬伤，而南方湘米漕运的兴起，就成为维系唐朝的重要举措。

“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被粮食问题困扰的唐代宗看完刘晏的奏疏，决定任用他改革漕运。

“移家深入桂水源，种柳新成花更繁。定知别后消散尽，却忆今朝旅旅魂。”唐朝大历四年(769年)，“安史之乱”的风雨刚刚停息。都城长安，春色渐老。关中地区由于旱蝗灾害，长安此时已不复开元盛世里的“稻米流脂粟米白”。而长沙城里，湘江之畔，正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的时节。被刘晏委任为湖南道转运使的戴叔伦站在湘江与春陵江的交汇处，跟同僚友人挥手道别。他眼中浮现的，是再过两个月，等夏粮丰收时，友人将从桂阳押运着漕粮，沿着二百余里的春陵江回到长沙，然后沿湘江一路向北到武汉，转汉水抵长安，用一船船湘米去平抑“斗米三千钱”的长安米市。

悲伤的并非只有戴叔伦，三年前，任转运使判官的好友刘长卿也曾在这里“江客相看泪如雨”。“安史之乱”结束，并没有让长安回复曾经的繁华，而转瞬间跌入了饥荒的深渊之中。晚唐张固和五代的王定保都说了同一件事，唐朝贞元三年(787年)，年方十六的白居易来到长安，将自己的诗作和拜帖呈送给当时的文豪顾况。当顾况看见拜帖封面上“白居易”三字时，忍不住调侃了一句“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呢！等他打开拜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又不禁连连赞叹说：“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得到夸赞的白居易从此声名鹊起。

在这则故事里除了看见白居易的才华和顾况的不吝提携，还有唐朝如影随形的粮食危机。当年唐末的藩镇割据截断漕粮运输通道，“长沙好米”再也无法滋养长安。面对北方残破的农业系统，以及关中地区锐减的耕地和人口，年轻的唐哀帝最后还是选择用禅让的方式终结了唐朝对粮食的强烈渴求。

台之军“由是资粮不乏”。就在刘坦在长沙励精图治之时，萧宝卷麾下的大将刘希祖率兵来犯，湘州各郡纷纷反叛，长沙几乎成了一座孤城。而由于粮食储备充足，虽然被围困了数月，长沙却依旧安然无恙。这为萧梁时代规模宏大的“江湖委输，方船连舶”的湘米漕运拉开了帷幕。

从刀耕火种，耒耜之勤，到仓廩殷殷，炊烟袅袅的“湖南熟，天下足”，无论作为支撑战争的军粮，还是作为“移粟救民”的赈灾粮，总能从岁月深处寻找到湖湘稻米去往天下最初的痕迹。如果岁月的每一帧场景都可以自由切换，那么可以相信，那一队被坚执锐的楚国士兵的行囊里，定携带着用“楚之粟”制作成的军粮；他们在春秋的竹筒里，在秦时的明月下一路疾行，去追随楚庄王问鼎中原，去跟着项羽打进咸阳。

但迄今为止，明确记载着湘米第一次走出湖南的，是东汉一次因旱灾引发的饥荒。

“惟永初七年十二月有闰六日戊戌，吴房长平阴张汜，字春孙，以谄请雨。”这块被称为“张汜请雨铭”的汉隶摩崖石刻，本来只是为了记录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次官方雨水活动，却意外地与一船船赈灾的湘米在《后汉书》里相逢。

东汉永初七年(113年)九月的洛阳，看着一封封报告灾情奏折的安帝刘祜显得格外心烦意乱。

东汉永初三年(109年)，武威郡“大旱，庄稼无收，发生大饥荒，人相食”；永初四年，东部劝农掾上报的水旱灾情：十郡“淫雨伤稼”“水旱饥馑，民或流亡”。这次又是多达七郡的旱灾。刘祜仔细回想，自从十三岁登基以来，各类天灾几乎没有停歇过。虽然还是沿用着过去移粟救民的赈灾制度，而且具体政策基本上还掌握在垂听政权的邓太后手里，但这一次，年已弱冠的刘祜想亲自处理。通过查阅近一年来论及灾情的奏报，刘祜发现灾害几乎遍及长江以北和以东的所有郡国，唯有历来以盛产稻米著称的长沙、桂阳等荆南数郡没有发生大的灾情。“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很快，一份由刘祜亲自拟定的赦令草稿就呈到了邓太后面前。

站在洛阳白马寺望向天之南，年轻的刘祜仿佛看见一艘艘漕船，正从春陵汇集到潭州，穿过洞庭，抵达九江，把一粒粒如膏如脂的湘米分发到饥民手中……

貳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沿着时光逆流而上，抵达一颗来自湖湘的稻米，就能读懂所有的盛衰，即使强如唐朝，一碗人间烟火就贯穿了它的盛世到落幕。

唐朝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的雨，几乎笼罩了长安(西安)的整个春夏。粮价飞涨，饥饿像瘟疫在颗粒无收的关中平原蔓延，就连皇宫御膳房的存米也不多了。唉！去洛阳吧，去洛阳吧，即将移驾洛阳去“就食”的唐玄宗是真舍不得长安的繁华，也是真的厌倦为了“就食”而一次次离京。

“朕不再愿意因为一口吃食而离开长安，而关中的出产确实越来越贫乏了，难以支撑长安日益增长的人口，裴爱卿，对此你可有良策?”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人口稠密，商贾云集的长安，像开在狭小土地上的花朵，开得越繁华，脚下狭窄的关中平原便越是不堪重负，即使“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也掩饰不住它的惶恐。《旧唐书》载，大唐鼎盛时期，为了供养长安地区近二百万的人口，不说从江淮地区漕运的粮食要从黄河入渭水，可途经三门峡河段时“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仅是将一石粮食从洛阳含嘉仓转运到长安，就要花掉近五百文的运费。

通过连日在长安地区赈灾时的深入了解，京兆尹裴耀卿对如何改革漕运，缓解长安的粮食供应压力，有了一大胆的想法。站在即将启程的龙辇边，裴耀卿娓娓而谈，唐玄宗紧皱的眉头也慢慢舒展开来。

此后的裴耀卿果然不负所望，他先是通过在汴渠口建河阴仓接收各地运来的漕粮，继而在最险的三门峡东西两侧设集津仓与盐仓，并在两仓之间的黄河北岸开凿出十八里山路，漕粮只需运到东侧仓后改走十八里陆路到西侧仓，再装船运往长安。通过裴耀卿的漕运改革，由江淮、湖广运往长安和关中的稻米，运输周期由90天缩短至40天，且由于损耗减少，年运量也从80万石跃升至250万石。长安米价从每斗200钱暴跌至30钱，关中地区仓储总量突破千万石。

唐玄宗终于不用移驾洛阳去“就食”了，暂时摆脱了粮食危机的长安终于绽放出它盛世的芳华。多年以后，漂泊辗转到长沙的杜甫还在回忆起长安那段丰衣足食的岁月：“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唐朝天宝十四载(755年)，当渔阳鼙鼓响

叁

当年，刘晏之所以无比笃定地判断潭州(长沙)、衡州(衡阳)和桂阳“必多积谷”，一部分可能是考虑到历来以偏远“卑湿之地”居之的长沙，并未受到太多战乱的波及，而历来传诵的“长沙好米”之名应是最吸引刘晏的原因。“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让这位永生在《三字经》里的晚唐名臣记忆深刻的，也许不是三国时曹丕所说“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而是跟他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南朝梁文人庾肩吾在《谢湘东王赉米启》中对长沙稻米最动情的描述那样：“味重新城，香逾澧水，连舟入浦，似伯彦之南归；积地为山，疑马援之西至……湘州七郡，大舶所出，皆受万斛。”

庾肩吾给刘晏的启启是：既然很久以前，湘州(长沙)七郡的稻米就已经比新城梗米的味道还好，比澧水的鱼味道更香，而且连绵的舟楫多得如东晋时袁宏运粮的船队；那堆在地上的谷堆，比马援征交趾时的粮草还高，从湘江上运粮来的大船，每一艘都能装上万斛的稻米……那么，如今的湘米就一定能够解决唐朝的粮荒。

其实又何止于庾肩吾的南梁，就在稍早的刘宋和南齐，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沙地区所产大米，都一直是当时军粮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必说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还在尾声，刘备趁着孙权忙着与曹仁对峙，便以诸葛亮为中将， “使督零陵、桂阳、长沙，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包括长沙在内的荆南四郡。得益于湖湘丰足的稻米供应，刘备不仅解决手下温饱，而且还扩充军队迅速壮大起来，为后面夺取益州，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只说一场“西台东昏”之战，就足以凸显长沙作为军粮基地的重要性。南齐永元二年(500年)冬，由于史称东昏侯的南齐继位者萧宝卷的荒淫无度，雍州刺史萧衍和荆州从事萧颖胥终于在南齐的落日余晖里打出了反抗的大旗，与远在建康(南京)的萧宝卷分庭抗礼，史称西台。西台很快就占领湘州这一充实的军粮供应地，次年正月，刘坦被任命为长沙太守。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刘坦深知粮食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一到长沙，他便选派能干的官吏分赴湘州各郡，征发人丁将“租米三十余万斛”运送到荆鄂前线，西

『湖南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巡抚高其倬反复咀嚼着乾隆御批。一份奏折，一句御批，标志着湖南正式成为全国粮食中心，民间谚语也完成了从『湖广熟天下足』到『湖南熟，天下足』的演变。

湖南熟，天下足

关  
晖

文脉长沙

壹

“风物长宜放眼量。”虽说时间的轮轂总是兜兜转转，但如果把世间所有的变迁都浓缩成一粒粒稻米，那么，一万年的风物也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又是一年秋欲半，荻花风起鲙鲈肥。”站在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的湘江亭上，看着运载各州县稻米的小船汇来长沙，然后满载湖湘稻米的巨大漕船缓缓起锚，年过花甲的湖南巡抚高其倬心中的那块巨石总算轻了不少。

没有人比弱冠入仕历经三朝的他看得更清楚：长沙作为“楚之粟”的原产地，仅仅凭借水运之利而成为天下粮食流通的四大米市之一还不够，湖湘还必须成为稻米种植的粮仓。从云贵总督、闽浙总督到两江总督，几乎主政过南方所有稻米生产省份的高其倬深知，随着多年城镇化的发展，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江南苏浙地区本身的商品粮一部分都需要从湖湘地区调运，曾经的“苏常熟，天下足”早已过时。而从康熙年间开始的人口暴涨，将很快就会让“湖广熟，天下足”也变成明日黄花。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怎样的饥荒景象！

“民以食为天。”必须尽快为清朝的粮食供应寻找安全有力的支撑！高其倬把目光投向了湖南，投向了长沙。这里自古便盛产稻米，这些稻米曾滋养出问鼎中原的强大楚国，在纷乱中歌舞升平的马楚、南宋偏安一隅的繁华，以及明朝如梦似幻的富庶。

“林才角闻布谷声，东风早已促春耕。吹来朝雨仍吹去，更放前溪一崦晴。”布谷声声，一身斗笠蓑衣的高其倬站在长沙城东的圭塘边，看着眼前这片由马楚时的“鱼塘”淤积而成的千顷早稻田，宋时便开始种植的“占城稻”在他的倡导下大力推广。占城稻不仅品质优，而且成熟期早，收割后完全来得及再种一季晚稻。这一年下来，得增加多少收成啊！如果把这种双季轮作的模式推广到更为广阔的浏江和沙河交汇的双江口塘田区，到了秋天，又将是怎样的丰收景象！绵绵春雨里，高其倬似乎听到了秧苗在水田里拔节的声音。

“了却君王天下事”的途径除了挑灯看剑，也可以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国泰民安。前一年，忧心忡忡的高其倬一到长沙，就接连上书，力陈利弊，在湖南强力推行早稻加晚稻，或稻加麦的一年两熟轮作复种模式。一年后的今天，随湘江边的漕船一起出发的还有飞往京城的奏报：“湖南本年雨水调匀，早稻收成十分者十之七八，九分者十之二三。晚稻亦俱丰稔，通省合计收成实有九分以上。粮价平减，民情安贴。”

其实，胸怀大志的乾隆虽然登基不久，但岂能洞察不到清朝潜藏的粮食危机。继皇帝位甫初，便将高其倬从湖北巡抚调任湖南巡抚，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能力与任职阅历。“果然是不负朕所望！”坐在养心殿，看完奏折内容，乾隆心中陡然一松。一边在心中暗暗赞叹高其倬敏锐的政治悟性，一边将手中的朱笔润了又润，最终在空白处留下御批：“语云：‘湖南熟，天下足’。朕惟有额手称庆耳。”

从养心殿回到三希堂书房，打开那本翻阅了无数遍的《资治通鉴纲目》，这里记录着从上古伏羲到明朝发生的每一次事件和历史更迭。从牧野的刀戈，到李自成的马嘶，从魏晋的纷乱，到唐宋的悲歌，千奇百怪，看似各不相同的历史事件最终都被司马迁和陈寿总结成了两句话：“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粥一饭，最终书写了人间所有的盛衰。

乾隆又开始逐字逐句圈圈点点起来，他准备把对前朝盛衰的感悟跟自己的执政实践结合起来，结集成册，作为清朝今后皇帝执政的参考，书名他都想好了，就叫《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去年旱毁约五六，今年家家食无粟。高困大庾闭不开，朝为骨肉暮成哭。官虽差官遍里闾，贪廉异政致殊殊。公家赋粟要有数，安得尽及乡民居……”直到西时末，奔走的毛笔写完揭傒斯《大饥行》诗中的最后一个字，紫禁城的官灯正渐次亮起，乾隆的思绪依然还停留在最终葬送了元朝的那场大饥荒中。

在元朝98年的历史里，仅仅是有记录的水灾、旱灾、蝗灾就多达两百多次。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三处决口，大量的农田被淹没，致45万户流离；江浙旱灾，更是造成了“禾不入土，人相食”的惨景。

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一场前所未有的虫灾席卷了湘中和湘南。那年夏天，田野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蝗虫，它们像浪潮一般，吞噬着大片的庄稼和农作物。虫群所到之处，庄稼一片狼藉，仿佛狂风吹过。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毁于一旦。

元朝至正初年(1341年)，湘江流域持续干旱，《元史·五行志》载：“民采竹实为食。”

至正十一年(1351)，湖南饥民开始大量加入农民起义军。失去了湖南粮仓的支撑，天灾人祸造就的大饥荒中，元朝再也不复草原铁骑的彪悍。“贫饥江南，富夸塞北。”一场粮食危机最终被韩山童书写成了一篇埋葬元朝的政治檄文。看着书案上那一册自用朱笔点校得面目全非的《元史》，乾隆不由得一声叹息。